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 文学与文化 •

# 论霍尔顿的话语困惑

## ——对《麦田的守望者》的分析

阮 倩 刘文松

(福建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对话是意识形态的实践场所,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个体成熟的重要标志。言语互动中良好受述者的缺失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的意识形态始终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他人言语对他意识世界的渗透与植入。霍尔顿的成长是一个盲目地吸收与重复他人言语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之音消亡与自我意识迷失的过程。自我声音的迷失,是转型期霍尔顿遭遇的话语困惑,也是他始终无法成长为成熟个体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霍尔顿 话语困惑 《麦田的守望者》

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生成过程就是选择性地吸收他人言语的过程。因此,“成为个体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人:学会一种我们自己的语言;不再盲目重复我们与之一同长大的那些言辞;从各种有用的话语中选择指事名物的方式;但是却将这些方式与我们自己的意向结合起来,以便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说话。”<sup>[1]</sup>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仅是个体意识形态与个人意志的实践,也是个体最终成熟的重要标志。

J. D. 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以主人公霍尔顿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他在纽约市三天两夜的流浪生活和痛苦的成长历程。小说中,当霍尔顿感到孤单时,就希望能回家跟妹妹菲比瞎扯一会儿,因为她总是仔细地倾听,并能理解他;当他沮丧得厉害时,就大声和死去的弟弟艾里讲话,因为艾里从不会反驳或打断他,艾里只是个幻影。对话的过程是一个价值评价的过程,因此对话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交际,它是意识形态的实践场所,是意识形态最好的表现舞台<sup>[2]</sup>。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外壳和内心世界的反映,是青少年表达内心愿望、质疑社会权威和追求个人理想的工具与方式。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霍尔顿实践个人意愿、彰显自我存在的最佳方式,也是处于青春转型期的他能最终成长为成熟个体的最佳途径。

### 一、人际场上的霍尔顿:言说“他人之音”的良好受述者

实践证明,霍尔顿在成人世界的言语竞技场上大都处于劣势的那一方。以他与潘西中学历

收稿日期:2013-12-13

作者简介:阮倩,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美国文学;

刘文松,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与西方文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经典小说叙事学理论在‘遁世作家’塞林格叙事作品主题意义中的批评实践”(课题编号:JA11150S)的研究成果。

史老师斯宾塞的临别对话为例,显然主导谈话的是斯宾塞。斯宾塞先说起“人生是场球赛”这个话题,霍尔顿口头附和,但隐没于内心的声音却是“球赛,屁的球赛”。接着斯宾塞开始训话,霍尔顿试图为自己辩解,但对方根本没有听。霍尔顿又试图以自贬自嘲的方式让自己摆脱窘境,于是信口跟斯宾塞胡扯起来。但他胡扯的兴致没持续多久,就被斯宾塞打断了。显然,斯宾塞在言语互动中控制着整个会话:他决定了言说的话题,随意地开始和结束对每一个话题的讨论,按他的意愿随意转移话题,或忽略霍尔顿所说的话。斯宾塞对对话进程以及对话内容的操控,剥夺了霍尔顿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权利。他在言语互动中的霸权地位窒息了霍尔顿实践自我的意愿。在接下来的对话中,霍尔顿只是机械地附和着他的提问。可见,师生之间的这场言语竞技最终成为斯宾塞展现自我意识形态的最佳舞台,而霍尔顿就是斯宾塞“卖弄自我”的理想观众,他扮演着一个良好受述者的角色,被迫地顺承着斯宾塞的意识,盲目地附和着他的言语,而自己的声音却隐没于他的权威话语之下。与学长卡尔·路斯的谈话让霍尔顿再次遭遇了言语竞技的挫败。在傲慢自大的卡尔面前,霍尔顿的自我之音遭到冷遇与嘲讽。显然,卡尔不是一个良好的受述者,霍尔顿也曾向女友萨丽·海斯敞开心扉,抱怨男校生活的污浊与低俗,提出与她一起到西部某地共同生活的想法。但世故的萨丽并不赞同他所说的,直接否定了出逃的提议。霍尔顿的意识形态并未获得女友的理解与接纳,双方发生了争吵,约会最终不欢而散。显然,在情人之间的这场言语对峙中,霍尔顿的意识形态并未占据上风。面对精明世故的萨丽,霍尔顿所言之“真理”被质疑,他的自我之音遭到了否定。

言语竞技的连连失意让霍尔顿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被压抑、忽略甚至否定的状态。良好受述者的缺失令霍尔顿无法被外界认同。不论他身处何地,寂寞与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对寂寞的恐惧又驱使他总想跟人说话,聊聊天。在开往纽约的火车上,霍尔顿和同班同学欧那斯特·摩尔的母亲攀谈起来,尽管他觉得摩尔龌龊下流,他仍违心地称赞他,说他谦虚而腼腆,人缘极好,还编出一段班会选举的故事来讨好摩尔的母亲,因为他深知母亲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多么了不起。在纽约旅馆的紫丁香厅里,霍尔顿主动和来自西雅图的三个姑娘搭讪,为投其所好,他谎称自己在舞池尽头看到了某位电影明星,让她们激动不已。在纽约中央车站的小饭馆里,霍尔顿与两位修女闲聊,互动氛围看似愉快和谐,但霍尔顿已变得格外谨慎,他不再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只说一些能给一次愉快的谈话带来好处的事情。他常跟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尽管他心里一点也不高兴,但他明白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必须说这类的话。当他遇到一些粗俗的人时,自己也就装得很粗俗。可见,言语战场的屡受挫败让霍尔顿学会了在人际交往时隐忍自我,察言观色,甚至不惜用谎言、胡扯来讨好他人,以维系良好的人际互动,从而营造徒有其表的和谐与愉悦。对话的过程已不再是霍尔顿自我意识形态的实践场所和表现舞台,而是一个言说他人之音、顺承他人之意的过程。因此,也就是霍尔顿自己的声音消亡的过程。

## 二、霍尔顿的意识世界:种种“他人言语”的汇聚地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一种话语关系。成功地操控对话不仅能彰显说话者的个人意志,也能建构起说话者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在“说”的这一行为过程中将其权威话语以“真理”或“知识”的名义加之于受述者,植入其意识世界,从而影响并塑造其察事观物的视点。看到学校的墙上写的“×你”两个大字,霍尔顿气疯了,因为他知道菲比和别的小孩总会看到它,虽然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总有个下流的孩子会解释给她们听,之后她们就会老想着并谈论此事。霍尔顿无法容忍的正是“×你”话语对菲比等孩童纯洁

无瑕的意识世界的侵蚀与玷污,他甚至希望能亲手把写这两个字的人杀掉,好杜绝“×你”意识对孩童们单纯心性的毒害,以守护她们永恒的纯真与洁白。但“×你”字样象征的正是成人世界的种种权威话语,作为言语竞技上的弱者,霍尔顿根本无法抹杀与逃避、无力抵御与抗拒“×你”所代表的权威意识形态的侵袭。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只要一不注意,就会有人偷偷地溜进来,在你鼻子底下写“×你”的字样。因此,霍尔顿成为个体的过程是一个盲目地吸收和重复他人言语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他人意识形态不断地植入与渗透的过程。霍尔顿的意识世界是种种“他人言语”的汇聚地,是许多“他人视点”的混合物。通过解析嵌入霍尔顿言语文本里的“他者之音”,读者可勾勒出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多种话语共同作用下霍尔顿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

霍尔顿对死去的弟弟艾里推崇备至,但他对艾里的偏爱实际上折射了教师们对好学生艾里的权威认知,“他实在聪明过人。他的老师们老是写信给我的母亲,告诉她班上有他那么个学生他们有多高兴。而他们也决不是随便说说的。”<sup>[3]</sup>霍尔顿没出席艾里的葬礼,但他说起葬礼时好像自己也在场似的,艾里死的时候,这整整一嘟噜混账傻瓜蛋(亲戚们)全都来了。我的某一个有极厉害口臭的姑母还不住地说,他(艾里)躺在那儿看去多安静,而这些都是D. B.告诉我的。因此,是D. B.的话语塑造了霍尔顿体验葬礼的视点。事实上,D. B.的言论话语是霍尔顿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D. B.参军期间,每次休假回来,都会向霍尔顿发泄他无法适应军队生活的愤懑情绪。D. B.的“发泄”言论嵌入了霍尔顿的意识世界,构建了成年霍尔顿与之相同的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解读模式,“我自己要是被征去当兵,一天到晚跟一嘟噜像阿克莱、斯特拉德莱塔和老毛里斯之类的家伙一块儿厮混,跟他们一块儿行军什么的,那我非发疯不可。”<sup>[4]</sup>因此,成年霍尔顿的愤世嫉俗、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很大程度上是对早年D. B.不良个性的顺承沿袭。

霍尔顿在叙述中不遗余力地挖苦和嘲讽好莱坞电影,但“电影语言”——一种以时空为物质外壳,以声像为建构材料,以蒙太奇为结构条理的直觉性符号系统——已经对他的想象力、知觉方式以及生活的理解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他的举止和派头——抽烟、酗酒,出入夜总会、酒吧、旅馆等鱼龙混杂的场所,和陌生女性搭讪、调情、跳舞——显然是对好莱坞影星鲍嘉等所饰演的黑帮老大或硬派侦探形象的模仿。霍尔顿在被皮条客毛里斯殴打之后所做的想象性报复就是对这类电影最直接、最明显的模仿。他所假想的报复情节就是好莱坞电影情景在其现实人生中的重现与延续。因此,尽管霍尔顿痛恨电影,但身处大众传媒已经铺天盖地的美国社会,他根本无法抵抗“电影语言”对其意识世界的植入与渗透。

霍尔顿痛恨学校,但身处社交、竞技、娱乐、消费为生活主体的青少年群体中,霍尔顿很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他从学长那里学到了许多性变态的知识,认识了一些搞同性恋的家伙,于是就一直等着自己突然也变成一个同性恋者。他对性充满了好奇,也渴望男女之事。他抽烟抽得凶极了,也喜欢“杯中物”,多次在酒吧和夜总会中故作老成地要酒喝,并喝得烂醉。可见,霍尔顿早已是他所憎恶的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他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大城市中产阶级子弟的生活作风与习性嗜好。

### 三、霍尔顿的青春危机:自我之音的消亡与自我意识的迷失

在巴赫金看来,“主体相当于意识。主体——‘我’的话语也是‘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的产物’。也就是说,主体在形成之前,他人就已经进入到了主体之中。”<sup>[5]</sup>然而,在这些“他人言语”的植入与渗透下,霍尔顿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是世上最会撒谎的人,哪怕就是去买一份杂

志,被人问起,他也会谎称是去看歌剧。他更加恐慌的是,取悦他人的谎言竟能变成自己的真实想法,言不由衷的话竟也像是发自内心的。热烈地拥抱女友萨丽后,霍尔顿对她说他爱她,虽然这是谎言,但令他发疯的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似乎也真的这么以为了。可见,始终无法言说自我的霍尔顿已习惯了在人际互动时用谎言与胡扯来应承他人,撒谎成了他下意识的应对机制与习惯性反应。而谎言折射的是他人的意识形态,承载的是他人的视点。谎言说多了,霍尔顿的意识形态在他人的种种视点的长期侵蚀下变得凌乱而混沌,自我意志与个人意愿也随着模糊而消解了。言语时,霍尔顿常盲目地重复使用一些所指缺失、空洞无味的呼语,如“嘿(boy)”,“王子(Prince)”等。说看法时,他乱用词汇,使评价前后矛盾,所指含糊。他说欧尼的钢琴弹得好,好得都有点流于粗俗了,但又不清楚自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很多人问起他在圣诞节前逃学流浪的经历,他重复说了很多遍,但被问到他自己的看法时,他又迷茫了,他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看法。这种自相矛盾、表意含糊、空洞无意的言语模式正是霍尔顿意识错乱、自我迷失的具体体现。霍尔顿的意识世界在他人视点的侵蚀下混乱不堪,自我在谎言外衣的层层包裹下萎靡而亡。对霍尔顿而言,成长是一个自我之音消亡的过程,更是一个自我消失的过程。每次穿越马路,霍尔顿总会有一种像是失踪了的感觉,“突然间,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发生了……我的脚才跨下混账的街沿石,我的心里马上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到不了街对面……谁也再见不到我了。嘿,我真是吓坏了。你简直没法想象”<sup>[6]</sup>。如果说“穿越马路”象征着霍尔顿所说的“过年轻人的一关”,即年轻人度过青春危险期步入成人的阶段,那么“自我的消失”就是他在人生转型期所遭受的青春梦魇,也是他始终无法成长为成熟个体的重要原因。

曾经的D.B.是霍尔顿崇拜的,如今的他利欲熏心,贱卖自我的才华,去迎合好莱坞的低级趣味。他以扼杀自我为代价来换取成人世界功利赛场的入场券。霍尔顿不愿重蹈覆辙,他终究不愿遗忘自己的声音,他通过虚拟与死去的艾里对话来保存奄奄一息的自我,“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每次我要穿过一条街,我就假装跟我的弟弟艾里说话……等到我走到街对面,发现自己并没失踪”<sup>[7]</sup>。他想象自己是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那些在麦田里无忧无虑的孩童以免他们跌落悬崖。霍尔顿在麦田地带的留守象征着他对自己纯真年代的执迷,他对孩童们的守护也代表着他对纯真自我的捍卫。面对青春期成长的考验,霍尔顿死守自我,终究不愿跨出“麦田”,以自我的消失为代价跌落悬崖之外那个污秽浑浊的成人世界,就如同那个洁白的雪球,他曾光着手紧握着,尽管会冻伤自己,会遭人误解,他始终不愿将之抛出,让之粉碎然后消融于暗如黑洞的成人世界。

以上分析表明,对话是意识形态的实践场所,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个体成熟的重要标志。言语互动中良好受述者的缺失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的意识形态始终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他人言语对他意识世界的渗透与植入。霍尔顿的成长是一个盲目地吸收与重复他人言语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之音消亡与自我意识迷失的过程。自我的消失,是转型期的霍尔顿遭遇的青春噩梦,也是他始终无法成长为成熟个体的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 [1]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 [2] [5] 金城:《巴赫金的话语、意义和意识形态观》,载《学术交流》2008年第12期。
- [3] [4] [6] [7] 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版,第35、130、183-184、184页。

(责任编辑:邢哲)